

簡報

浙江大學宋學研究中心

2012 年第 11 期



2012 年 03 月 16 日

按：2012 年 2 月 13 日，韩国崇实大学金泰晚教授来宋学研究中心访问讲学。金泰晚教授是研究韩国理学与中韩儒学文化交流的专家，他曾经组织了韩国三名学者，花四年时间，翻译了東景南教授的著作《朱子大传》。15 日，金泰晚教授在宋学研究中心作了题为“宋学东传朝鲜及其影响”的专题报告。现将该报告的第二章节摘录于下。

朝鲜士大夫从元朝传入朱子学而主遵新秩序的意义

高丽时期，政治文化上受到汉唐儒学的影响以确立典章制度，而在宗教文化上以佛教信仰为主。但朝鲜之政治文化与宗教文化以程朱新儒学为唯一的领导理念。在朝鲜王国全历史中，朱子学享有天下独尊的地位。所以由高丽向朝鲜的转换不但是政治上的王朝更替，它更是意味着文明的转换。

高丽时期，思想界的特色是三教共存，互相折中发展。虽然言必讲“三教鼎立”，其实道教渗透民间信仰，在当权君王与臣群集团内，亦佛教与儒教的对立更明显。因为高丽历代替王公妃嫔，如前朝新罗仍信佛教，拜高名佛僧为国师，所以经过科举当官的儒臣们怏怏不乐，对高丽诸王推崇佛教颇为不满。早在成宗（981-997 在位）时，正匡行选官御事上柱国崔承老会指出：

臣闻，人之祸福贵贱，皆始于有生之初，当顺受之。况崇佛教者，只重来生因果，鲜有益于见报，理国之要恐不在此。此三教各有所乐而行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生而远，舍近求远不亦乐乎？人君惟当一心无私普济万物，何用于不愿之人，费全库之储，以求必无之利乎？《高丽史》卷 93<崔承老传>

担当现实政治的官僚的看法来看，佛教虽然拥有其存在的理由，可是更重要的是现实当务的儒学弘扬发展。尤其是到了高丽时期，寺院经济的扩大以及大规模信佛活动的盛行导致国家田制紊乱，进而引起财政荡尽的结果。不仅如此，佛教僧侣勾结权力以惑世诬民，剥削人民丧失超世间的精神，终于变为另一种权力机构。佛教的堕落，对于高丽社会加强引发一个主导社会的崭新的思想理念。

元来，高丽时期的儒学受到汉唐儒学的影响，主要以经学、史学和词章为中心。（玄相允，《朝鲜儒学史》），玄音社，1982，P.14）这样文风也蕴含着自己固有的使命，但因为读书人为了到达自己立身出世的目的利用这词章的儒学，逐渐置重“华而不实”，朝廷也重文轻武，终于颓落了学问的根本精神，即批判与省察的精神。再加上重文轻武的世风，最终导致了武人造反，而武人当权后，儒风渐衰，学问颓堕了。

“香灯处处皆祈佛，丝管家家竞祈神。唯有数问夫子庙，满庭秋草寂无人。”（《晦轩实记》卷1<题学宫诗>）此诗非常鲜明的表达了当时儒学处于怎样的凄凉的状况。发表此诗的儒学者安珦（1243-1306）是介绍朱子学于高丽社会的本人。还有高丽末代鸿儒李穡（1328-1396）在上恭愍王的疏章中也感慨道：“今之学者，将以干禄，诵诗读书，嗜道未深而繁花之战已胜，雕章琢句，用心大过而诚正之功安在？”（《高丽史》卷115<李穡传>）勿论民间信仰的道教，王公贵族的佛教，还是儒学都不能再为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气象和动力。黑夜越长黎明越近，而穷则变，变则通。时代呼唤新的学问思想，而在这儒学的濒死处境从而使新进学者们发愤而暗中摸索。朱子学就是答应这种历史呼唤的学问。

上述安珦，是传入朱子学的最初的人物，他痛心于当时学问思想的情况，呼诉学习朱子学为当务之急。近因兵戈之余，学校颓坏，士不知学，其学者喜读佛书，崇信其杳冥空寂之旨，吾甚痛之。吾当从中国得见朱晦庵著述，发明圣人之道，排斥禅佛之学，功足以配仲尼。欲学仲尼之道，莫如先学晦庵，诸生行读新书，当勉学无忽。（《晦轩实记》卷1<论国子诸生文>）

他从元朝抄写了朱子著述的主要内容，还临摹了孔子和朱子的真像带来回国。此后，高丽又派人到元朝带回了孔门弟子的像，购买了文庙用的祭器，乐器以及经书等，还设立了赡学钱，以成均馆为中心逐渐展开儒学的中兴。从而，高丽儒学，急速再编以朱子学为主，尤其从李穡当成均馆大司成后他门下聚集天下俊才以成了最大的学派。

总而言之，如此来从元传来的朱子学担当了新时代的新思想理念。虽然龚愍王追求积极改革，受到朱子学而改革成均馆，培养国士，勉勤学问，但时代已经步入了不可反转的地步。

他死后，强稳两个政派互相斗争，全面改革派得到桂冠，开过创业，大大开启了朝鲜之门。开创朝鲜王朝者，也是朱子学者，守护高丽命派者，是朱子学者，他们之间，亲戚朋友，同门师兄弟，而因学问理念的差异分手了。但他们理解朱子学的水平还不太高。只不过遵守先进学问而企图充实地理解，还没达到完全理解以独创解释的地境。

朝鲜王朝，一开始就面临着深刻的权力内部的互相斗争，而王权比较稳定之后，不久又被湮没在保守“勋旧”与革新“士林”的斗争涡流中。这四次发生的祸乱就是称为“四大士祸”。与中国历史上重重发生的党锢、党禁一样，士祸给予士林派很沉重的打击。原来，士林派是以继承郑梦周的义理精神的在地土族为中心的革新派。还有另一个勋旧派是参与开国功臣的儿系，世宗（1418-1450 在位），成宗（1469-1494 在位）治世培养的官学派与历代国戚之后裔造成的保守派。燕山君在位（1494-1506）时期勃发的戊午士祸（1498），甲子士祸（1504），中宗治世（1506-1544）的乙卯士祸（1519），明宗在九五时期（1545-1567）的己巳士祸（1545）就是两派你死我活激烈斗争的四大士祸。“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天下>）缘这几次士祸被挫伤义气的士林派，在这几次接战被毁减力量的士林派一旦退却，隐居于乡里，专神于学问研究，养育后进，蓄积乡村的公论，而企图卷土重来。在这一段过程中，士林派一边加强深化朱子学的了解，一边图谋以再组织乡村自治机构，比如说书院，乡约等，成为儒家理念支配的社会，而终于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局面。尤其士林派在指导乡村社会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小学》而教化乡村，摸索自己的伦理道德的优越地位。

在这历史的情况下，朝鲜社会逐渐改变了名实相符的儒教社会。而且只少有在政治、文化、学术上，完全更替佛教，而占有独尊地位。从此之后，韩国儒教文化的特色，比在现实改革，务实经世，更在伦理道德，义理名分上鲜明地表出。

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

2011年03月16日